

F12-53

212

经世济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经世济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世济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编.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80234-439-6

I. 经… II. 北… III. 改革开放-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393 号

书 名: 经世济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439-6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箱: bianjibu16@vip.sohu.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CONTENTS | 目 录

- 1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高度化、
 经济效率化 刘伟 张辉
- 10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
 ——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 郑学益 张亚光
- 35 改革开放 30 年：保险业的嬗变及发展路径
 的审视 孙祁祥 锁凌燕 郑伟 肖志光
- 51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回顾
 与展望 章政
- 63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 郭红燕 刘民权
- 92 改革开放 30 年：从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看中国宏观
 经济调控政策的演变 张延 焦健
- 112 改革开放 30 年：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
 进程的考察 黄桂田 张辉 黄泽华

123	对产权理论的合理继承、借鉴、运用和创新	王志伟
144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利于公平还是利于增长	林双林
166	解除监督、农民的定价权与重新谈判——从不完全契约 的视角看中国农业改革	平新乔 梁爽
187	渐进式与“休克疗法”式改革的比较分析及 最优渐进式改革模式	李绍荣 程磊
203	我国金融工程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历程和 问题探讨	王一鸣
216	国企裁员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截面和面板 数据分析	夏庆杰 宋丽娜 John KNIGHT Simon APPLETON
246	转型经济学的框架变迁、基本争议与中国范式的 全球价值	王曙光
264	私募股权研究回顾及对中国监管的启示	欧阳良宜
27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率变化	刘伟 蔡志洲
289	后 记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 增长与结构高度化、经济效率化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就是工业化的深入。工业化的基本内涵就是指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其伴随而来的经济效率提升。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的转变，主要是工业部门的产值份额迅速提高，这是量的层面的变化；二是经济效率的提升，即所有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这是质的层面的变化。只有量和质两个层面的同步推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的转变方式可以分为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两种基本类型，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关键在于：在推进市场化的同时，把产业结构变迁统一于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的有机结合中。对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我国而言，产业结构高度的推进，关键在于如何在深入改革和完善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效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其产业结构发展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产业结构既产生量的变化，也产生质的变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轨迹

1978 ~ 2007 年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根据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特征，可以分成 1978 ~ 1983、1984 ~ 1991、1992 ~ 2002、2003 至今四个阶段。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年均 GDP 增长率达到了 9.8%。虽然各个年度的增长率有一定起伏，但是各个阶段的平均增长率都很高，而且呈逐渐加速趋势。四个阶段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7%、9.6%、10.2% 和 10.8%。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明显扩张，和 1978 年相比，按可比价格计以 GDP 反映的 2007 年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当

年的 14.96 倍，第一产业为 3.65 倍，第二产业为 23.15 倍，第三产业为 18.96 倍。中国现在一个月创造的 GDP，比 1978 年全年的还要多。

在第一阶段，由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农业生产首先得到了启动，并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虽然中国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一直是各个产业中较低的，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极大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体制创新能够把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这也是在那个阶段农村经济成为中国生产力中最活跃部分的基本原因。1981 ~ 1984 年，第一产业连续 4 年保持了 7% 以上的高速增长，从而使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从 1978 年的 28.2% 迅速提高到 1983 年的 33.2%，提高了 5%。而从进入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以后，第一产业的增长率开始下降，以后一直保持着相对较低的增长率，改革开放 30 年来，第一产业的年均增长率为 4.6%，明显低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和第二、三产业的增长率。这种增长率较低的现象是由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无论就世界农业的一般增长率还是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增长率而言，4.6% 的年均增长率已经相当高。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农业在经济起飞前的发展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增长周期中，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开始提高，1984 ~ 1991 年间，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11.4%，远远高于启动阶段 2.4%。在这一阶段，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纺织工业等得到迅速发展，以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为代表的新型家电工业的发展，使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升级。轻纺工业的发展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反过来又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发展。如果从加速工业化时期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中国开始进行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即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转为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

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经济增长周期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这一扩张趋势继续延续。第二产业的增长率继续提高，年均增长率达到 12.7%，第三产业仍然保持高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10.3%。而第一产业的增长率则回落到 3.8%。第二个经济增长周期是中国由第一次产业升级向第二次产业升级的过渡。这一阶段初期，轻工业仍然是工业化的主流，但具体的主导行业有所变化，消费产品的升级带动了工业产品的升级，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产品如电脑、通信产品、电子产品、空调等发展了起来。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了新的特点，在传统第三产业发展

的同时，现代第三产业（金融、通信、房地产、航空与高速公路运输等）也发展了起来。到这一阶段的后期，也就是在世纪之交前后，由于宏观调控、亚洲金融危机和产业调整等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减缓，从 10% 以上（1996 年以前）下降到 10% 以下，从 1992 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也转为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和加强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对经济结构加以调整，推动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或者说是第二次产业升级，即主导行业由轻纺工业开始向重化工业转型。新一轮的转型是在新的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发生的，汽车、住房等更高级的需求，以及国际市场上对中国工业产品扩大的需求，对中国的重化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拉动作用，而改革开放后到当时中国长达 20 年的经济增长造成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为这一次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 2002 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第四个增长周期。不仅增长率在加速，其主导产业也和上一周期开始时完全不同，钢铁、水泥、建材等原材料和技术装备的产量迅速上升，许多产品的产量都跃居世界前列，重化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国作为新的国际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中国实现了第二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升级的原因，从需求方面看，在于国内外投资和消费的持续拉动，而从供给方面看，是由于长期增长积累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已经使中国能够在较高的水平上发展自己的工业。第二次产业结构的升级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都迅速提高，中国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经济影响力的大国。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

1978 中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比为 28.2:47.9:23.9，从数字上看，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似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实质进展的程度并不大。由此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中第二产业虽然已经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标准，但实际上此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还十分落后。这表明产业结构量的变化只是一种表象，不一定代表经济效率和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我们用“产业结构高度”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那么产业结构高度应该既是各产业的份额和比例关系的一种度量，同时也是各产业的经济效率的衡

量。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高度较高，表明这个经济体中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的份额较大。只有当产业结构的演进能使得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至更高的水平，同时，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提升速度越快的产业和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以及比重提升的速度越快，这样的产业结构演进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所谓“结构效益”的提升。否则，我们只能将其称为产业结构倒退或者说是“虚高度”。对经济发展有长远意义的产业结构高度演进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原有要素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新增的要素和资源也被配置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导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的份额不断上升，使得不同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共同提高。因此，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内涵：一是比例关系的演进；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前者是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量的内涵，后者才是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质的内涵。

为此，我们设立了一种既可用于横截面数据比较也可用于时间序列比较的产业结构高度指标。这个指标的数值越接近 1，表明其离完成工业化的终点越近。测算产业结构高度的指标，并进行横向和纵向数据的比较，我们得到以下几个有意义的结论（刘伟、张辉、黄泽华，2008）。

首先，对产业结构高度的国际比较发现，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地大于 1，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则显著地低于 1。从产业结构高度的视角来看，至 2006 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完了三分之一多点。但是，产业之间并不是均衡的，第三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快于第一、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

其次，对产业结构高度进行时序比较发现，从 1985 年开始，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工业化时期。除了 1989 ~ 1991 年期间出现短暂的波动以外，产业结构高度一直稳步推进。从 1998 年开始，产业结构高度进入加速提升阶段，中国经济也逐渐走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良性发展轨道。以 1998 年为界，1978 ~ 1998 年期间产业结构高度年均增长 0.5 个百分点，1998 年之后进入加速工业化时期，年均增长 3.5 个百分点，以这个速度继续发展，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将在 2024 年达到 1，也就是完成工业化。与此相对应，1978 ~ 1998 年期间，我国城镇化率由 17.9% 提升至 30.4%，年均提升 0.625 个百分点，而 2007 年则提升至 44.9%，1998 ~ 2007 年期间我国城镇化进入纳瑟姆城市化曲线中的

加速增长阶段，年均提升 1.61 个百分点。按此进度，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将于 2023 年结束。由此可见，按照目前发展态势，我国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都将在 2024 年左右完成，而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则锁定在 2030 年，这也进一步表明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充分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的。

最后，对国内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的研究发现，根据产业结构高度的水平值，各省市可以分为三个阶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大于 1，处于第一阶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在 0.5 和 1 之间，处于第二阶梯；河北、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则在 0 和 0.5 之间，处于第三阶梯。从平均的视角来看，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非均衡增长造成的，除了上海较接近以外，北京、天津距离完成工业化尚有一段距离。中国各省区的数据普遍显示，第三产业的增长对产业结构高度的带动很大，第一、第二产业距离完成工业化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三、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产业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升。从 1998 年开始，产业结构高度进入加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也逐渐走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良性发展轨道。这表明不同时间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

1. 从投入产出分析看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我们用历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对中国 1992 年以来直接消耗系数和中间需求系数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通过三大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中间需求消耗矩阵时间序列研究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及价格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的影响（刘伟、蔡志洲，2008）。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技术进步对降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的水平 and 改善经济增长效率做出了贡献，但由于价格关系的改变和中间消耗水平较高的部门比重增加，用现行价格反映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率反而是上升的。要改变这一趋势，保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各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率要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

（1）如果用现行价格编制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动态分析比较，1992 ~ 2005 年

的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整体上是上升的。中间消耗率由 0.6060 上升为 0.6223, 其中, 由于技术因素使中间消耗系数提高了 0.38%, 而由于部门结构因素使中间消耗系数提高了 1.25%, 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系数提高了 1.63%。这说明, 在包含价格变动在内国民经济投入产出价值量分析中, 结构变动对于中间消耗水平的影响大于技术因素。

(2) 按可比价格计算, 1992 ~ 2005 年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率即直接消耗系数由 0.6060 下降到 0.5745, 这反映了在消除价格变动因素之后, 技术进步对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间消耗的贡献。其中, 技术进步使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水平降低了 4.56%, 由产业结构变动所形成的影响为 -1.41% (即使中间消耗水平提高了 1.41%), 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使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率降低了 3.15%。这说明技术进步对提高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做出了贡献。

(3) 对比按照不变价格和现行价格分别进行的分析, 我们看到, 对于技术进步, 不仅要技术角度考察投入产出关系, 还要从经济角度考察产品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即使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 由于市场原因, 还是可能出现一个部门单位产品的中间消耗比率上升的现象。我国近些年的发展就反映出了这一点, 这就需要通过更大的技术进步, 来抵消这种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造成的中间消耗的提高。

(4) 第二产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最大、同时又是增长最快的生产部门。由于第二产业本身的生产性质, 无论从现行价格还是可比价格来看, 它的中间消耗率都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最高的。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 在工业化进程中, 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会随着轻纺工业替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升级、制造业替代轻纺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产业升级而有所提高, 但是随着第三次产业升级即中间消耗水平较低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水平会逐渐下降。中国目前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在改善各个部门中间消耗水平的同时, 注重新兴产业的发展和部门结构的优化, 是降低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2. 从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看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效率的贡献

如果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 我们可以将产业

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效率的贡献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不断减弱(刘伟、张辉,2008)。20 世纪 80 年代,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一直大于 50%,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技术进步的贡献;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基本持平;1998 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不显著,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代表的市场化的力量已经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这样,克鲁格曼(Krugman, 1994)所指出的不可持续的东亚增长模式与我国 1998 年之前经济增长模式是比较类似的。不过 1998 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逐步降低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则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在全要素生产率内部,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也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关系。由此可见,1998 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体现出了其自身的可持续性。

(1) 劳动生产率的分解。本文利用劳动生产率的分解式实证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结构效应(产业结构变迁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度被称为结构效应)的趋势以及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及其趋势。这些研究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①在 28 年(1978~2006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效应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累积贡献度为 38.5%。第一产业的结构效应是负值,但第一产业的产业内增长效应更显著,因为第一产业有内生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起到正面效应,但低于第二产业的产业内增长效应,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内的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的结构效应最显著。第三产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但第三产业的结构效应大于产业内增长效应,表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结构效应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而不是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

②结构效应受到宏观经济和有效需求的影响而呈现波动性。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结构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当经济处于低迷时期,结构效应呈现负值。结构效应的波动性表明产业结构的变迁是由需求结构的变化而推动的,这一特征对于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

③在1978~2006年中,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效应的贡献度是逐渐降低的。1991年之前,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效应的贡献度都大于50%。从1991年开始,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摆脱依赖结构效应的状态,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提高等导致的产业内增长效应开始在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之前,第三产业依赖于粗放式的增长,1998~2002的通货紧缩对第三产业则是因祸得福,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供过于求的状况促进优胜劣汰,逼迫企业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技术效率、加快技术进步,因此1998年是中国第三产业提高产业内技术效率、加快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起点。

(2) 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我们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对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我们不仅度量了结构变迁的作用,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而且还分析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在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变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度十分显著,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为43.5%。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不断减弱。1998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不显著,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代表的市场化的力量已经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

②资本要素的结构变化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出现资本深化过快的现象,资本劳动比增长远快于资本产出比,但更致命的是,资本边际报酬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对于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投资增速一旦下降,经济增长则会减速。劳动要素的结构变化的分析显示单位资本所能带动的劳动正在减少,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资本正在迅速地替代劳动。这一方面可能导致资本边际报酬的下降,另一方面则限制了劳动就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加大了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与农村的第一产业的劳动收入差距。

③对三次产业的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的资本和劳动边际报酬上升很慢,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仍很漫长。第二产业的高速的资本存量积累是出现资本深化过快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恶劣后果的主要原因。工业部门(第二产业的主体)资本深化速度过快,一方面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过快以及投资需求的

增长趋缓，产出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化所能带动的劳动就业增长率正在下降，这不利于劳动工资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资本深化速度比较合理，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组合比例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且第三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远大于第二产业，约为第二产业的 4 倍。尽管如此，第三产业的技术效率并不高，依然以外延式的增长为主，提高经济效率的任务仍很漫长。

(刘伟 张辉)

参考文献

- [1] 刘伟，张辉.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 经济研究，2008（11）
- [2] 刘伟，张辉，黄泽华. 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 经济学动态，2008（11）
- [3] 世界银行. 1989 年《世界发展报告》.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 [4] 刘伟，蔡志洲. 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改善国民经济中间消耗. 经济研究，2008（4）
- [5] Krugman P. ,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A Cautionary Fab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

在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分类中，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基础的理论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现代经济学的渊藪在于欧美，因此同其他学科相比，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独一无二的本土性，“……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①。也正因如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是须臾不可分的。

如果把 1902 年梁启超提出“中国生计学史”的学科概念作为始点^②，中国经济思想史已经走过了 100 多年的历程。赵靖先生曾经对这段历程有大致的概括^③：①发轫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至 40 年代末；②学科的奠基时期——1956~1965 年；③研究工作恢复发展和学科呈现初步繁荣的时期——结束十年内乱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述三个阶段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分期，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史的考察，大多围绕这些历史时期展开。

有关这门学科发展的总体回顾性研究，国内不少学者已经做出了卓越的成果，如：赵靖、张鸿翼、郑学益（1984），吴申元（1984），叶坦（2003），刘甲朋、魏悦（2003），程霖（2004）。另外，巫宝三先生（1982）在中国经济学家访问加拿大代表团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对当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叶世昌先生（2002）对建国前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评述；赵晓雷教授（2004）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第十一届年会上总结了 2002~2004 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情况。但就学术史的分期角度而言，专门研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文献目前尚属空白。本文拟对此阶段时期内该学科发展的轨迹和若干问题展开讨论，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

① 叶坦：“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 36 页。

③ 赵靖、张鸿翼、郑学益：“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经济科学》，1984 年第 3 期。

来学科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总结和展望提供一点参考。

一、30 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概述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是近百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最重要的时代标记之一。文革期间，社会科学受到冲击和影响尤甚，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未能幸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清除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为学术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董志凯教授在谈及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时认为^①：首先，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能；其次，经济制度创新的改革使历史评价有了准绳，拓宽了研究的对象；再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开拓了研究的眼界；最后，改革开放之后，学科研究开始走向世界。以上四点虽然是就中国经济史面临的学术环境所言，但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学术氛围日益宽松，为各门类经济学的发展准备了全面而深厚的基础条件，中国经济思想史无论从学科建设还是研究成果等方面来看，都取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远为辉煌的发展成就。

1. 高校、科研机构学科设置与研究生规模

经过近 30 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在高等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学科设置和研究人员数量有大幅增长，但在不同的时段内发展速度也有所差别。

1978 年之后，设置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之前未进行过这方面工作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也纷纷添设。根据赵靖、张鸿翼、郑学益的统计^②：“十年内乱前，全国只有个别学校招收过少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1984 年前后）全国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的单位已有十个左右，在校和已毕业研究生约三十人左右。”

2002 年，国内招收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高校及科研单位是 13 所，

① 董志凯：“改革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开拓了坦途”，《经济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② 赵靖、张鸿翼、郑学益：“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经济科学》，1984 年第 3 期。

从单位数量上看与 1984 年的 10 所相比没有显著增长；在研究生招生规模上，由于当时大多数高校在招生时没有明确标明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三级学科方向，表 1 内的招收人数至少要有 50% 的缩减。以三年学制为基准，2002 年前后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在校研究生数量至多在 90 人左右。仅从数字上比较，1984 年至 2002 年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员规模有 3 倍的增长。但是，研究生招生数量仅能从一个方面反映本学科纵向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由高校招生总数缓慢增长的整体趋势所推动的。具有中国经济思想史招生资格的高校及科研单位的扩充，是更能体现学科普及与发展程度的数据。在这一方面，自改革开放直到 21 世纪之初，本学科并没有获得突破性发展。这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诞生较晚、某些基础性问题尚未厘清有较大关系。在这 20 年时间里，研究人员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领域的扩展等方面，所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大多留在本单位作为研究梯队的后备力量，也没有余力考虑全国范围内学科点设置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这个阶段确实是“学科呈现初步繁荣的时期”^①。

表 1 2002 年国内招收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高校及科研单位

招收学校	所属院系	招收人数（不分具体方向）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4~5 人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2~3 人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2~3 人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4 人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2 人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1~2 人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11 人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3 人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	2 人
武汉大学	经济学院	2~3 人
中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2~3 人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5 人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	2~3 人

注：2002 年数据中，绝大多数高校没有区分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招生方向；除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明确本专业招生人数外，其余学校都属经济学院大类招生，其估计数字根据历史调查获得。数据来源：《研究生入学考试招生问答及全国各高校招生介绍》，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① 赵靖、张鸿翼、郑学益：“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经济科学》，1984 年第 3 期。